

论范仲淹的“吏隐”情结

郝美娟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通常意义上的“吏隐”往往饱含着世俗的人情味, 也意味着隐逸文化由抗争转向顺应。北宋名臣范仲淹在他三次贬谪外任地方官之际, 流连往返于名山秀水之间, 自称“吏隐”。他安贫乐道的人格操守使其“吏隐”具有温润平和、和谐从容的特征。其“吏隐”涵盖了向内向外两个维度的意义, 向外为世人立法, 履行社会责任; 向内则开辟心灵的一片净土, 追求精神的自由。

关键词: 范仲淹; 吏隐; 乐道; 严子陵

中图分类号: I207.22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300(2011)01-0070-04

FAN Zhong—yan's Official Seclusion Complex

HAO Mei—juan

(School of Literatu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official seclusion usually implies the worldly human touch and the reclusive culture shifting from fighting to accommodating. FAN Zhong—yan, a famous official, called himself a hermit, lingered around famous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rivers when he was degraded and banished three times. He lived happily in spite of poverty, which was typical of his peaceful, harmonious and care-free life. Outwardly, he fulfilled his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making laws; inwardly, he found his peace of mind by seeking after spiritual freedom.

Key words: Fan Zhong—yan; official seclusion; happiness; Yan Zi—ling

范仲淹,字希文,江苏吴县人。他是北宋重臣,也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范仲淹一生出将入相近四十年,政绩卓著,其功业文章可谓辉映百代、彪炳千古而为万世景仰。他曾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警句,实践了其作为儒家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并开有宋一代士大夫忠义高尚之风气。或许正是因为卓越的政治成就、至大至刚的人格操守掩盖了其放游山水之间的潇洒从容,“几时身退琼坛畔”、“一枝巢隐自逍遥”,^{[1] (P02)}那份对隐逸的深切向往之情则常常为人所忽视。只要翻开范公的作品集,我们就会发现,其字里行间所吐露出的志在丘壑、冲澹自守的心绪是那样深、那样浓、那样的从容平和、潇洒飘逸。

范仲淹的仕途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和许许多多

的文人士大夫一样,他也曾经历了宦海生涯的起落沉浮。宋仁宗明道二年(1032),因谏废郭皇后而处知睦州。景祐三年(1036),因上《百官图》弹劾吕夷简而被贬江西饶州。庆历五年(1045),因庆历新政的天折而被贬邓州。面对人生的患难,他却少有唐人那样激愤之语与牢骚不平之气,反而在被贬期间,徜徉于明丽秀美的山川之间,过起了闲适愉快而诗情画意的吏隐生活。“吏隐”一般是指士大夫在外任地方官之时,既避免朝廷的纷争,又能享受闲适自由的生活、居官而犹如隐者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是我国士大夫文人面对人生的出与处、仕与隐、进与退的人生矛盾时的一种平衡机制与调节方式,其本质在于士大夫文人既不能摆脱政统现实的控制,又要努力摆脱现实人生的束缚而暂得人生的自由,所以

收稿日期: 2010-10-10

作者简介: 郝美娟(1979—),女,山西太原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一般意义上的吏隐往往包含着浓厚的世俗人情味，也意味着文人士大夫人生追求由外在的昂扬奋发向内在的闲适自足的转折、隐逸精神由以道抗势、追求个性自由的积极意义转向求取内心的自足与生活的适意。

宋人之吏隐往往直接受启发于中唐白居易知足饱和的中隐理论，范仲淹也仰慕乐天晚年“知足保和”的闲适人生方式，“进则尽忧国忧民之情，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1] (P23)}但是与白居易的世俗功利以及价值虚空而人生无法依归截然相反，范仲淹却走出了平庸世俗的生活方式，以其崇高独立的人格以及对流连山水的生命诗意赋予了“吏隐”新的意义与特征。他深怀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一生不遗余力地恢复儒家传统道德，挽救五代以来颓靡的士风，而对于民生社稷的深切关怀更是至死不渝。他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安贫乐道”的人生准则，巧妙地平衡了仕与隐、进与退之间的人生矛盾，从而赋予了“吏隐”从容平和、优游不迫的美学特征，正如他在《谢苏州谢两府启》所言：“风俗未殊，足张调教，江山为助，宁慕笑歌，鹤在阴而亦鸣，鱼相忘而还乐，优游吏隐，谢绝人伦。”^{[1] (P18)}

一、范仲淹吏隐的特征：从容平和、优游不迫

范仲淹出知睦州时，写信给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晏殊，信中这样写道：“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谁谓幽遐，满目奇胜，衢歙而水，一浊一清，如济如河，百里而东，遂为浙江。鱼钓相望，鳧鹭交下，有严子陵之钓台，方干之隐茅，又群峰四来，秀状如嵩，白云徘徊，终日不去。岩泉一支，潺湲斋中。春之画，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隐者之乐，恐逢恩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人从事，俱富文能琴，夙宵为会，跌唱交和，忘其形体。郑声之娱，斯实为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诗。其为郡之乐，有如此者。”^{[1] (P82)}

周孔教《万历本范文正公集序》评范仲淹有关日常生活的诗歌“温润和雅”。蔡增誉《万历本范文正公集序》也认为他的诗歌“平和温洽，如父子家人。”温润和雅、平和温洽正好可以评价范仲淹在吏隐各地时期的文风与人生态度。“千峰秀处白云骄，吏隐云边岂待诏”。^{[1] (P102)}知饶州时，“三出专城鬓如丝，斋中潇洒过禅师”。^{[1] (P113)}知润州时，“不更从人问通塞，天教吏隐结山居”。^{[1] (P117)}知邓州时，“南阳偃息养衰颜，天暖风和近楚关”。^{[1] (P124)}无论宦途多么坎坷，每到一处，范仲淹都能以“悠悠乘画舸，坦坦解朝绅”的平和而从容的心境优游于山水之间，而在晚年，庆历新政失败，人生事业上的高峰

过去之后，范仲淹退隐悠闲的心情变得更加浓郁。皇祐元年（1049）60岁的范仲淹知杭州，这可以视为北宋朝廷对于这位功绩赫赫的一代重臣的恩惠，而范仲淹对此也感激不尽。在被贬睦州时，范仲淹写下了《潇洒桐庐郡十绝》颇能代表他“吏隐”时悠游不迫、快乐从容的审美感受与人生情趣。我们不惮其烦，兹录如下：

潇洒桐庐郡，鸟龙山霭中。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

潇洒桐庐郡，开轩即解颜。劳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潇洒桐庐郡，全家长道情。不闻歌舞事，绕舍石泉声。

潇洒桐庐郡，公余午睡浓。人生安乐处，谁复问千钟。

潇洒桐庐郡，家家竹隐泉。令人思杜牧，无处不潺潺。

潇洒桐庐郡，春山半是茶。新雷还好事，惊起雨前芽。

潇洒桐庐郡，千家起画楼。相呼采莲去，笑上木兰舟。

潇洒桐庐郡，清潭百丈余。钓翁应有道，所得是嘉鱼。

潇洒桐庐郡，身闲性亦灵。降真香一炷，欲老悟黄庭。^{[1] (P97)}

这里的环境清幽静谧，山川如画，既得渔者之乐，又有生命的闲适安乐。这十首组诗如一气呵成，而首首皆以“潇洒”开篇，可见范公对桐庐生活的喜爱程度以及他徜徉于其间的潇洒快乐、从容平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范仲淹何以如此平和，何以如此从容？首先，作为北宋功绩卓著的政治家，其远见卓识与博大开阔、从容不迫的襟怀气度使他对于政治人生有着较为理性的认识与看法，对于以往士人怨怒乖张、黑白分明的处世方式，范仲淹并不赞同。《与省主叶内翰书》：“汉李膺之徒，黑白太明，而禁錮戮辱，虽一身洁清，千古不昧，奈何邪正相激，速天下之祸，汉室亦从而亡之。……宜遇过同忧，无专尚名节，而忘邦家之大，则天下幸甚。”^{[1] (P263)}正是因为如此，范公不以人生的得意与失意为意，“仕宦自飘然，君恩岂欲偏。才归剑门道，忽上洞庭船。坠絮伤春目，春涛废夜眠。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1] (P93)}“江上多嘉客，清歌进白醪。灵均良可笑，终日著《离骚》”。^{[1] (P99)}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音乐享受，范公最推崇的还是那些神清气和、雅远清静之作品，“关乎处士之作，己子然弗论，洗然无尘。

意必以淳，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无虚美，无苟怨。隐居求志，多悠游之咏，天下有道，无怨愤之作。骚雅之际，此无愧也。”^{[1] (P178)}“师深于琴，余尝听之，爱其神端气平，……故其音清而弗哀，和而弗淫，自不知其所以然，情之至也。”^{[1] (R197)}另一方面，范仲淹的人生思想还受到道家委任自适的影响，“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身后事，一自从元中来，却归天中去，谁是亲疏以，谁能主宰？既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来往”。^{[1] (P664)}“人生忧多乐少，惟自适为好，此间疏懒成性，日在池塘，或至欢醉，亦依旧行气不废，且遣疾耳”。^{[1] (R75)}

而范公“吏隐”之“乐”在根本上源于其我国古已有之的“乐道”传统，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乐感文化的特质。“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R43)}“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2] (R21)}“乐道”的人生态度在范公诗文作品、书信往来中俯拾皆是、屡见不鲜。“乐道忘忧，雅对江山之助，含忠履洁，敢移金石之心”，^{[1] (P387)}“而水石琴书，日有雅味，时得佳客，相与咏歌，古人谓道可乐者，今始信然。”^{[1] (P86)}“涉道圭深，退即自乐，非深沉之可摇也”^{[1] (P706)}“唯君子为能乐道，正在此日矣。”^{[1] (P707)}

范公为人外和内刚，其潇洒悠游之气，与孔子晚年“舞雩之乐”有异曲同工之妙。“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 (R59)}道乃我国古代士人毕生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然而此严肃庄重却非我国士人人生的最高境界，正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超越伦常秩序或宇宙自然而获得一种“不待乎外而足乎己”的盈盈的审美乐感方为我国文人以及审美文化中之最高境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此处乐不只是音乐，更是指主体快乐的心灵感受。而此种乐又绝非世俗的感官欲望之乐，乃是得道之后的审美乐感，朱子注“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乐之者，有所得而乐之也。”^{[3] (R15)}“好知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见得此理可爱可求已得之于己。凡天地万物之理皆具足于身，则乐莫大焉。”^{[4] (P84)}

我们多次提到，由于中国文化中没有外在的神，所以与西方文化通过基督、神灵而走外在超越的道路不同，中国文人只有通过内在超越的路线而获得审美的乐感与人生的解脱。在宗教文化的世界里，西方人的悲剧虽然深刻而震撼人心，然而无论如何，他们可以通过基督去寻求精神的解脱与心灵的皈

依。而对于中国人来讲，现实世界残酷无情，人生历程漫长而又艰辛，却只有通过“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5] (P520)}“不待乎外而足乎己”的方式，通过自我主体的艰苦奋斗、自我道德修养的努力完善与培养去获得人生的乐感，在污浊而残酷的现实人生世界，最大限度地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完整，回归到宁静朴素的大自然去追寻心灵的家园与人生的安慰。无论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安贫乐道，立足于伦常秩序而又对其进行超越，还是道家否定现世的犬马声色而齐一物我，如庄生梦蝶、濠濮间想至乐无乐的逍遥境界，“乐道”毫无疑问是二者相通之处。朱氏注“张敬夫曰：‘此古之学者，所以自强而不息者与？’”^{[4] (P115)}李泽厚先生说：“现代学人常批评中国传统不及西方悲观主义之深刻，殊不知西方传统有全知全能之上帝做背景，人虽渺小，但有依靠。中国既无此背景，只好奋力向前，自我肯定，似乎极度夸张至‘与天地参’，实则因其一无依傍，悲苦艰辛，更有过于有依靠者。中国思想应从此处着眼入手，才知乐感文化之强颜欢笑、百倍悲情之深刻所在。”^{[6] (R77)}

二、范仲淹吏隐的意义：独立自主的人格追求

一般意义上的“吏隐”饱含着世俗的人情味，往往意味着士大夫人格的逐渐向内转折，是士大夫为追求人格的独立与精神自由而选择的一种迂回曲折的人生方式。“吏”是士大夫文人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是世俗生活的基础，而“隐”则是人格自由与闲适人生在相对意义上的获得。作为一名儒家知识分子，范公“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7] (R69)}然范公为人“外和内刚”，加之安贫乐道的人格操守，因而他赋予“吏隐”一词以新的内涵与意义。“吏隐”在范公而言已不仅仅是闲适世俗的生命享受，它一方面是人生自适的实现与获得，而另一方面也是其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的实现，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格风范，是“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岂量尧舜心，如日照孤臣”^{[1] (R42)}的胸襟气魄。范仲淹一生与许多隐士有颇为密切的往来，对于隐士“独立高尚”的人格怀着更多地是崇敬与仰慕的心情：“如近代之陆龟蒙、陈陶，今朝雍丘邢敦，钱塘林逋，或执节坚介，或放词雅远，皆四方之闻人”，^{[1] (R78)}“莫道隐君同年少，樽前长揖圣贤情”，^{[1] (R81)}“片心高与月徘徊，岂为千钟下钓台。犹笑白云多事在，等闲为雨出山来”，^{[1] (P88)}“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矧今颌方面，岂称长城倚。来访卧云人，而请无诸己。得无

长者言，佩之玉非美。”^{[1] (P54)}早晚功名外，孤云岂得亲，^{[1] (P79)}“落落崆峒一大儒，四方心逸忆江湖。东南赖有林君复，万里清风去不孤”。^{[1] (P8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范仲淹将严子陵这一形象拔高到无以复加、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在范公之前，严子陵这一形象就已走入宋人的视线，如“我来亦有沙洲兴，愿借先生旧钓竿”，^{[8] (P083)}“鸟尽弓藏良可哀，谁知归钓子陵台”^{[8] (P45)}等等。然而，严光被如此推崇尚属首次，“风雅先生旧隐存，子陵台下白云村。唐朝三百年冠盖，谁聚诗书到远孙”，^{[1] (P102)}“子陵台畔观渔钓，无限残阳媚绿蒲”。^{[1] (P101)}《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惟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二世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于名教也。某来守是邦，始构堂奠焉。乃复其为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1] (P190)}

范仲淹重塑了严子陵这一已被忽视很久的隐逸典型，并使这一典型在北宋文坛上大放异彩，而严光的意义在于实际上涵盖了宋代士大夫人格建构的两个基本维度，或者说人生理想的两个基本维度，向外是为世人立法，为君主立规则的巨大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亦即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向内则是开辟一片心灵的净土，使心灵得以安顿的精神需求：“圣人画‘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因署其堂曰‘清白’。又构亭于其侧，曰清白亭，庶几居斯堂，登斯亭，而无忝其名哉！”^{[1] (P9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伟岸的精神气度与“杯中好物闲宜进，林下幽人静可邀”^{[1] (P102)}奇妙而完美地统一起来，充溢于诗歌的是其至大至刚、藐视一切功名富贵的伟岸气度，不依靠他人而独立自主的人格力量。范仲淹“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士大夫群体而非个人具有独立人格，建构起人格、气节，而且第一次

使士大夫群体而非个别人物具有了自由之精神”。^{[9] (P28)}与此前吏隐文人内心深处的忧谗畏讥、惶惶不可终日不同，范仲淹表现了北宋文人吏隐人生追求中新的对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向往。

对范仲淹而言，吏与隐是合二为一的，是一体的两面，二者并行不悖而互为表里。作为一名忧国忧民的政治家，“吏”是实现其经国济民的方式，而“隐”是其独立的人格操守的完成。为何在积极入世的同时，平静地接受生命苦难，作为一位儒家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能实现其道，而富贵荣华、升沉进退并不是生命的本质的快乐。只要了解了此点，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范仲淹何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宣言，何以能够在遭遇贬谪的命运安排时仍然能积极为天下苍生积极奔走，浙西救灾、兴办学校、提携后人、经略陕西。在那颗“道德的心”实现的同时，生命的乐感也随即实现。而这颗心又是充沛的，如流动不息的泉水，生动而活泼，充满了诗情画意。牟宗三先生《道德的理想主义》有曰：“道德的心，浅显言之，就是一种‘道德感’。经典的言之，就是一种生动活泼怵惕恻隐的仁心，生动活泼，是言其生命之不滞，随时随处感通而沛然，莫之能御。怵惕恻隐是生动活泼之特殊化，或说是它的内容。在不滞之心之感通中，常是好善恶恶，为善去恶，有所不忍，迁善改过，意识生物生理的活泼，乃不是此处所说的活泼，即便智巧的灵力不是此处所说的生动。如果没有怵惕恻隐之心为本，则这一切聪明才智都是在陷于物欲的机括中耍把戏，其生命已经是呆滞而被窒塞了，那里还能说是生动活泼。”^{[10] (P33)}而范公所饱含的不就是一颗活泼生动、充沛饱满的仁心吗？

[参考文献]

- [1] 范仲淹. 范仲淹全集[M]. 李勇先, 王蓉贵点校.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
- [2] 刘宝楠. 诸子集成·论语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3] 朱熹. 四书集注·论语·卷三[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4] 黎靖德. 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5] 刘宝楠. 诸子集成·孟子正义·卷十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6] 李泽厚. 论语今读[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4
- [7] 李之亮注. 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二十[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7.
- [8] 傅璇琮. 全宋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9] 刘方. 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9
- [10] 牟宗三. 道德的理想主义[M].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85

[责任编辑 赵喜桃]